

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 日本的殖民地教育

—評介《戰前日本のアジアへの教育關與》論文集—

歐素瑛

書名：《戰前日本のアジアへの教育關與》

作者：國立教育研究所

出版刊物：《國立教育研究所紀要》

期次：第121集

出版地：日本東京

出版時間：平成4年3月

一、前言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即以西方爲師，積極模倣歐美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現代化制度，於極短的時間之內，一躍而爲世界強權之一，進而倣效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道路，向外進行殖民統治，包括1895年領有臺灣、1910年併吞朝鮮、1931年佔有滿洲，以及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佔領東南亞地區等，成爲戰前主宰東亞地區的最大支配勢力。惟戰後檢討殖民主義時，各殖民地人民不免以其自身遭遇，將所有的罪惡歸因於帝國主義教育之「奴化」、「愚民」等，日本自然成爲亞洲各國衆矢之的，由是有進一步反省與檢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殖民地教育之必要。

戰後由於後殖民主義的盛行，各殖民國家紛紛反省或檢討其於近代帝國主義盛行期間，對於殖民地所做所為之適當性或正確性，日本亦不例外。近年來，日本積極進行與世界各國之教育文化交流、充實強化國際交流活動，以促進相互之瞭解，因而積極進行相關資料之蒐集與課題之研究。十幾年間，國立教育研究所在其國際研究協力部亞洲教育研究室的主持下，分別聘請各個領域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比較教育學、亞洲教育史、地域研究、國際關係論等方面之研究，先後發表在該所刊物《國立教育研究所紀要》，其中，《アジアにおける教育交流 — アジア人日本留學の歴史と現状 —》（第 94 集，昭和 53 年）、《お雇い日本人教習の研究 — アジアの教育近代化と日本人 —》（第 115 集，昭和 63 年）等專號，詳細剖析日本在戰前、戰爭期間對於各殖民地支配和軍事佔領之歷史背景、強行推行「日本化」、「皇民化」教育之過程、實況、評價及反省日本於戰爭期間之行爲，以及日本「過去的責任」進行謝罪和賠償等。

《國立教育研究所紀要》第 121 集之主題爲〈戰前日本のアジアへの教育關與に關する總合的研究〉，分爲〈明治日本のアジア諸國の教育近代化に及ぼした影響〉、〈日本の朝鮮、臺灣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とその對應〉、〈戰前日本の對中國教育政策とその對應〉、〈太平洋戰爭下日本の南方教育政策とその對應〉四部，係 1990 ～ 1991 年間，在該所國際研究協力部長阿部洋主持下，從事近代日本對中國、臺灣、韓國、東南亞等地區教育近代化的影響，探討日本在各地之教育實態、構成特質、正負面遺產及歷史教訓。參與共同研究者有專修大學商學部助教授蔭山雅博、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細野浩二、名古屋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馬越徹、高千穗商科大學教授上沼八郎、釧路短期大學教授弘谷多喜夫、同朋大學社會福祉學部教授槻木瑞生、岡山縣立短期大學助教授石井均，以及南山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明石陽至等教育史學者。

本文擬評介該集第二部弘谷多喜夫：〈日本統治下臺灣の民族運動と民族主義教育要求の展開 1911 ～ 1922 年〉、上沼八郎：〈臺灣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行政史の一考察 — 「芝山巖事件」について —〉、槻木瑞生：〈中國吉林省龍井村の朝鮮人學校 — 東北地區朝鮮族の學校の展開 —〉、馬越徹：〈《インタビュー — 記録》回想の京城帝國大學 — 松月秀雄氏の教授生活〉，

以及第四部明石陽至：〈軍政下シンガポール、マラヤにおける日本の教育政策〉、太田弘毅：〈太平洋戦争下フィリピンの教育〉、西村重夫：〈日本占領期インドネシアの地方教育〉、石井均：〈太平洋戦争下日本の對南方教育政策 — 大東亞建設審議會の答申とその實踐をめぐつて —〉等八篇論文，諸文分別探討戰前日本在臺灣、朝鮮所實施之殖民地教育政策，以及中日戰爭暨太平洋戰爭期間，對東南亞各國所實施之占領地教育政策等。以下就主題不同之各論文進行綜合評析，進而檢討當前之研究思潮與研究成果。

二、內容介紹

第二部：〈日本の朝鮮・臺灣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とその對應〉

第一篇作者為釧路短期大學教授弘谷多喜夫，其曾與廣川淑子共同發表〈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朝鮮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の比較史的研究〉，對於日治下臺灣與朝鮮之教育政策有深入的探討。而其〈日本統治下臺灣の民族運動と民族主義教育要求の展開 — 1911～1922 —〉一文，探討日本的殖民地教育與1920年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之關係，以及臺人對於日本領臺之態度與因應之道，指出日本領臺以來，臺灣亦如近代其他的殖民地一般，基於民族主義教育或民族運動之要求，在島內外發起臺中中學設立運動、臺灣同化會，以及東京留學生抗議事件等，與前此之武裝抗日運動，在性質上雖有不同，然皆係抒發其對日本差別待遇教育政策之不滿。

1911年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隈本繁吉到中南部視察時，林獻堂代表臺灣之鄉紳、知識階級向其表達臺人對於差別教育之不滿，並提出內臺共學的要求。蓋公學校雖為臺人之初等教育機關，然學生以下層階級子弟居多，無法滿足有繼續升學慾望之上層階級子弟的需求，由是有設立臺人子弟中學校的必要。經辜顯榮、林獻堂等人與學務部代表多次會商之後，臺灣人中學校的設立始日趨具體化，並於1914年1月決定設立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1915年公布「臺灣公立中學校官制」，入學者以中上階級子弟居多，此一教育要求實乃近代化與民族自覺的結果，可謂為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先聲。

其時島內因應政治要求的擴大，乃有臺灣同化會的成立。該會係在林獻堂

與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元老板垣退助的努力下所促成的。板垣氏認為日臺係同文同種之亞細亞民族，應使內臺人親善融合、平等共處，並對日本在臺所實施之民族差別政策多所批判，得到臺人的熱烈迴響。至於島外的情勢，尤其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則轉趨積極，包括內地延長主義與六三法撤廢要求運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及臺灣文化協會的設立等，得到島內外知識分子的歡迎，雖均遭總督府的彈壓與檢閱，但卻得到原敬內閣同意積極推行內地延長主義、登用臺人出任官吏、內臺人通婚、改正地方制度、內臺人共學等成果，並開啓1922年以降臺灣民族運動與民族主義教育要求之先聲。

第二篇為高千穗商科大學教授上沼八郎所撰之〈臺灣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行政史の一考察 —「芝山巖事件」について—〉，其曾在《世界教育史大系》中撰〈臺灣教育史〉，並在《信濃教育》第948號發表〈芝山巖の昔と今〉，故本文實係前此二文之姊妹作。作者首先闡述殖民地之一般性矛盾，即近代主義與同化主義之糾結問題，認為殖民地競爭乃是伴隨資本主義國際化而來的必然現象，最初是向外傳教，繼之追求商業利益，最後才是武力競逐，由是引發民族間之對立與抗爭。近代日本進入世界舞臺之情形亦不例外，以達成其「脫亞入歐」的目標。關於其在臺灣所實施之折衷的同化政策，係本其「內地延長」主義的原則，強制實施宗主國之語言、風俗等，產生明暗兩極的矛盾現象，而芝山巖事件即為矛盾的最初象徵。

接著，作者企圖以小觀大，以領臺之初的芝山巖事件、領臺35年發生之霧社事件等反抗事件，呈現出日本在臺之教育理念與精神。前者係臺灣總督府實施軍政遭致臺民反抗，造成6名學務課員遇難的事件；後者為推行民政之後的安定期間，已歸順之原住民11社300名襲擊霧社公學校事件，造成139名日人遇難。兩者均係在教育場所發生之反抗事件，在臺灣殖民地教育行政史中有其重要意義。惟戰後國民政府對於上述事件，因主客觀環境、意識形態之改變，不但完全廢除神道、神社，對於事件之見解亦有不同，即由日治時代強調日人在臺灣犧牲、開拓之「芝山巖精神」，轉而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褒揚臺人「反奴化教育」之抗日精神。顯見，由於政權之轉換，對於不同種族統治時期之歷史事件，給予不同之歷史評價，乃是可以理解的現象。

第三篇為同朋大學社會福祉學部教授槻木瑞生所撰之〈中國吉林省龍井村

の朝鮮人學校 — 東北地區朝鮮族の學校の展開 — 〉，首先檢討龍井村近代教育之意義，說明日本入侵滿洲後，分別以關東州、滿鐵及臨近朝鮮的「間島」作為據點。其中，「間島」為日俄戰爭前後陸路上到達滿洲北部所經常通過的道路，也是日本控制滿洲與朝鮮半島的關鍵地，居民以朝鮮人居多。1903年，中國在局子街設置延吉廳，作為其在間島的行政與交易中心。1907年8月，日本在龍井村設置韓國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作為其在間島的政策中心，由齊藤季治郎出任所長，從事排除中國勢力及任命朝鮮人官吏的工作，並於是月7日，成立以朝鮮人為對象的間島普通學校，一直到1909年11月派出所撤廢為止，日本政府所補助的私立學校高達50餘所，同時，居住在當地的漢族亦有獨立的學校，由是展開中日之間激烈的鬥爭。

其次，東北地區傳統的書院、書堂，則與近代的學校並存，其中有一部分並順利地轉換為近代的學校，而且，這些學校往往兼具抗日學校與近代化的雙重特質。同樣的，在教學科目之安排上，隨著日本對朝鮮支配的強化，不但有近代的教育科目，且仍保留傳統的儒教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東北地區之朝鮮族學校，以使用朝鮮總督府所編纂之教科書為主，各學校無法自行決定教學科目與教科書。至於間島學校教員的來源，以間島的中央學校出身者最多，亦即以中等學校出身者最多，其次是初等學校，素質普遍不高。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朝鮮族的學校進行整理，並與中國的學校合併，而龍井村學校之開展，實兼具傳統的教育及近代的教育，係由傳統轉換到近代化之具體呈現，扮演著承先啓後的關鍵性角色。

第四篇為名古屋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馬越徹所撰之〈《インタビュー 記録》— 回想の京城帝國大學 — 松月秀雄氏の教授生活〉，係口述歷史之訪談紀錄，探討戰前日本在殖民地朝鮮所創設之京城帝國大學，為時雖僅短短的20年，但對朝鮮的歷史，則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松月氏1917年自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卒業之後，先後擔任過成蹊學園教諭、旅順師範學堂教諭、旅順工科大學預科教授等，接著，前赴英、美等國留學，從事教育學研究，並自1926年開始擔任朝鮮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教授，其時，京大教授多係留學歸國之新銳知識分子，包括安部能成、速水滉、田保橋潔，及松月氏等，尤其文法科教授，以出身東京帝國大學者為主，教授陣容十分整齊與堅強。

除了教學工作之外，松月氏亦從事教育學研究工作，著有多本朝鮮教育史之相關書籍，而且由於他熟諳英語、中國語及朝鮮語，由是前往農村、學校演講，企圖從事全生活、全人的指導，使學習不只限於學校之內。至於朝鮮人學生大多優秀，尤以習醫之比率最高，教育學之畢業生亦復不少，以出任師範學校或高等普通學校教師居多。戰後，京城帝國大學不論在型式上或精神上都產生實質的改變，校名取消「帝國」二字，日籍教授也於昭和 20 年或 21～22 年間紛紛遣返回國。回國之後，松月氏於 1946 年前赴廣島，任教於九州大學法文學部囑託、山陽高等學校兼山陽女子高等學校校長，未久，轉往東京，擔任東京理科學大學教授、東京理科學大學長事務取扱等職。學生們則按照學籍簿，全部編入九州大學。至於朝鮮人的態度，亦隨著日本之敗戰與日人之遣返而有所改變，由以往的低姿態轉而採取高姿態。

由上述四文可見，日本在臺灣、朝鮮實施之殖民地教育，確實達成相當的成果，在其有計畫地推展教育政策之下，就學率與識字率均大幅提高，然而臺灣與朝鮮，因為歷史、民情、風俗上之不同，所呈現之結果亦有一些差距，戰後兩地對日本殖民教育之評價亦呈現明顯的不同，前者係肯定其近代化的努力與貢獻，而後者則基於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情感，而全盤否定之。無論如何，日本之殖民地統治，除了殖民主義之特質之外，也含有近代主義之色彩，並為戰後兩地之發展奠立基礎。

第四部：〈太平洋戰爭下日本の南方教育政策とその對應〉

第一篇是南山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明石陽至所撰之〈軍政下シンガポール、マラヤにおける日本の教育政策〉，敘述 1941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日本佔領新加坡期間，以該地作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實行軍政統治，以維護治安、重要國防資源的取得、作戰軍的自給自足為軍政三大目標，並以各民族文化與日本文化的合一、專門技術的習得、日本語的普及，以及勞動精神的促進等為占領地教育方針，建設為日本在東南亞之經濟與軍事基地，在教育上之施設，去除英國殖民時期之影響，完全廢除歐洲式教育，積極展開日本語教育、皇民化教育，以訓練現住民「日本人化」與「皇民化」為目標，並與日本帝國精神及產業技術的發展相配合。

在初等教育方面，進行原來教育制度的調查、學校的整理、教員的再登記、學生再入學的計畫等。1944年3月，為達成軍政下的教育目標，特別擬訂刷新強化初等教育、民族黨化學童、軍民一體化等方針，並在維護治安的前提下，關閉內容不適當的華僑私校，禁止華僑社會使用中國語教育等。同時，軍政監部以教員之日本教化訓練不充分為由，要求各市州學校實施教師的再教育，尤其強調日本精神、日本語教育、皇民化教育，以及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的訓話。除此之外，尚有昭南興亞訓練所和各種訓練所的設置，以涵養青年學生之奉公精神及熟習日本語為目標。至於軍政監部直轄之馬來醫科大學、馬來警察官鍊成所、昭南船員養成所、電氣通信學校、郵政局鍊成所、水產修鍊場等，均以技術教育、實業教育為重，以獲取重要資源。

惟日本占領東南亞時期，為時僅3年8個月，且教育政策實處於決戰的準備狀態，特別著重精神面的強調，教育品質與內容，自然是無暇兼顧了。

第二篇為東北女子短期大學教授太田弘毅所撰之〈太平洋戰爭下フィリピンの教育〉，將太平洋戰爭期間菲律賓歷史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2年1月3日至1943年10月14日的日本軍政時期，第二階段則是1943年10月14日至1945年8月17日，在日本的容許下獨立的菲律賓共和國，由Jose. P. Laurel擔任大統領進行統治。第一階段之教育方針，係植基於大東亞共榮圈的基礎之下，為建立新秩序建設的意義與認識，由是日菲親善，遠離美英而親近日本，偏重物質建設及道德的涵養、鼓吹普及日本語及初等教育，振興實業教育及勤勞精神等，並組織教科書審查委員會，進行教科書之檢閱工作，刪除書中有關英美之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思想，以及反日、反東亞之意見，同時，為推展占領地教育，文部省也延聘專家編纂教科書，以儘速去除美英影響，改行日本式的新教育。當然，國語政策和日本語教育之普及，亦為此時該地教育之主要工作之一。

第二階段之教育方針為鼓吹國家意識與民族主義的教育，尤其注重教師資格、國語講授及私立學校之管理三項。首先，出任教師資格有三：(一)中初等學校教師需通過政府試驗，取得免許狀；(二)須遵守教育厚生省之「教育者道德律」；(三)教師有遵守國策的義務；(四)菲律賓籍教師須接受國語教育、人格教育及菲律賓史之教育。其次，在國語政策上，規定初、中等以上學校需講授國

語，養成國語教師，達成全面講授國語的目標。最後，對於私立學校之管理，除要求校長、教員須有免許狀外，教授科目、學生、經費、教師薪俸等，皆須得到教育厚生大臣之認可，而且，優先任用當地人出任教員與校長，以達成「教育菲律賓化」的目標。至於外國人經營的學校，則以人種的偏見、教授科目有害菲律賓人名譽、傳統習慣等理由逕行關閉之。

第三篇爲九州大學教育學部助教授西村重夫所撰之〈日本占領期インドネシアの地方教育〉，以印尼之日本語歷史科教科書《兵補》、《勞務者》、《警防團》、《ジャワ奉公會》、《青年團》、《義勇軍》等爲素材，分析1942年3月至1945年8月約三年半的時間內，日本占領期間的教育狀況，並說明由於該地民族、文化上的多樣性，致使教育的實態亦趨於複雜。在學校制度的變革方面，實施六三三學制，統一使用日語教學，且爲達成其急速獲得重要國防資源的目的，特別著重專門技術教育的發展，尤其是石油工業、農業教育、護士養成學校，以及航空學校、航海學校等，均與日本的軍政統治有直接而密切之關係。至於師資之培育，則有二年制初等師範學校、四年制中等師範學校及六年制高等師範學校之設置，主要研習日本的風俗習慣、日本語、日本的愛國歌等，爲日本意識形態之宣傳者。在教育活動的特色方面，除禁止荷蘭語之使用外，強制使用日本語、日本語教育義務化、實施軍事教練、重視日本風俗習慣與歷史等，與新加坡、菲律賓大同小異，尤其是日本式教育活動的導入，包括每天早晨唱日本國歌、向日本天皇敬禮、接受軍事訓練與體育、勤勞奉仕、體罰等，有助於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實現。

事實上，隨著1938年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政策之開展，以及日軍戰火波及南洋，爲宣撫所佔領之地區，日本佔領軍政府除了更改學制、招收學生、實施日語教育之外，還利用報紙、雜誌、演講等進行文化宣傳工作，甚至到了戰事危急之際，還積極推行皇民化工作，可以說與殖民地臺灣、朝鮮之情形如出一轍，實係臺灣、朝鮮經驗之移轉與引用。

第四篇爲岡山縣立短期大學助教授石井均所寫之〈太平洋戰爭下日本の對南方教育政策 — 大東亞建設審議會の答申とその實踐をめぐつて —〉，係就日本政府與軍部中央在大東亞建設審議會之會議紀錄，探討日本軍政下東南亞各國之教育實態，以及強行推動「日本化」政策的情形。首先說明大和民族

對於其他民族支配的特權，包括陸海軍為戰略上之需要及重要國防資源之取得，而南向推進之大東亞共榮圈的版圖、大和民族在南方占領地之優越性，以及重視「日本精神」、日本語，以「鍊成」南方民族之皇民性格等，其次則是南方進出者與鍊成機關的設置，包括：(一)政府與軍部所設立之「興南鍊成院」、「大東亞鍊成院」等鍊成機關；(二)南方的日本人鍊成機關由興南奉公會所指導規劃，計有新任者講習、修練道場及拓南青少年訓練所之設立，以鍊就具有健全修養與文化的團體；(三)現地人的鍊成機關，屬於「道場型」的鍊成機關，在「昭南興亞訓練所」的統籌下，由官吏、警察官、教員、技術者、農村指導者進行指導，實施徹底的日本生活，以培養南方民族之日本精神，建立其對日本之認同感。

上述四文係探討太平洋戰爭以後，日本在南洋各地之佔領情形與教育政策，其共同特點為日本語教育、精神教育及皇民化教育之推行，多係藉由教育的方式，包括教育方針的擬定、教員的養成、教科書的審查、日本式教育活動的導入等，以貫輸人民對於日本之認同感，並配合其擴張政策之推行。

三、內容評析

綜觀上述八文，雖以單篇論文形式集結，不若專書體例之嚴謹，但若從內容、資料，以及相關課題之研究來看，實與學術專書相似，以下僅提出幾點讀後心得。

(一)資料豐富而多元

綜觀上述八篇文章，係日本有關教育學者之研究成果，所運用之資料，自然以日本所藏相關史料為主，包括：(1)官方典藏史料 — 日本防衛廳戰史部、復員局史實部、軍政總監部等；(2)社團法人典藏史料 — 教育協會、新加坡協會、菲律賓協會、東洋拓殖株式會社、教育史學會等；(3)軍政官員回憶錄 — 渡邊渡少將：《軍政日誌》、《大東亞戰爭中南方軍政的回顧》；佐佐木輝久：《軍政回顧錄》；德川義親：《德川日記》；《ホセ・P・ラウレル博士戰爭回顧錄》等；(4)政府公報 — 《軍政公報》、《軍政月報》、《馬來公報》、《比律賓情報》，以及議事錄等；(5)近年來相關的研究成果等，所運用

之史料相當多樣而豐富。此外，各篇文章皆能善用圖表以供佐證，並補充文字敘述之不足。惟有待補充之史料尚有：(1)被占領地或被殖民地民衆之看法，亦即占領地輿情之探討尚付諸闕如，(2)較少運用被占領地或被殖民地近年來之研究成果，僅傾向於單方面之說明，缺乏雙向互動關係之探討，為美中不足之處。

(二)教育施設之一致性

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的基本方針，係兼具同化主義與近代主義之特質，一方面是懷柔、宣撫，積極貫徹其「日本化」、「皇民化」的教育政策，一方面是懲處、討伐，強力鎮壓反日行動，以雙管齊下的方式，推行其「近代化取向的同化政策」。換言之，戰前日本的殖民地教育，係隨著軍事上的佔領而推進之殖民地支配，尤其是太平洋戰爭期間，對東南亞各地之教育政策，除引進「日本化」的教育活動與設施之外，實係為配合其擴張政策之需要，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之夢想，而以該地區作為其軍事與經濟上的後盾，使人民對其產生認同，以向歐美各國挑戰。要言之，日本對占領教育之基本方針，向採「日本語教育」與「皇民化教育」在前，而實業教育與國防建設在後的政策，不但影響及教育內容，也對一般民衆之生活產生具體的影響，與臺灣、朝鮮之情形，並無二致，亦即日本係以其在此二殖民地之經驗，引用於東南亞地區。顯見教育實係日本帝國主義遂行其政治野心最重要的手段，以塑造其所須之人民與人才。

在上述八文中，明顯可見臺灣、朝鮮及滿洲等地之殖民經驗，對於後來日本之佔領南洋，在統治之方向與措施上有其關聯性，但各作者在探討之時多未能進一步說明前此之經驗與後來之統治間的關係，以及前此之殖民地當局在南進政策上所扮演之角色與地位等，僅將各該地區孤立視之，不免有所缺憾。

(三)區域間之差異性

南洋地區原係美、英、荷等國之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對於殖民地亦不若前此之嚴謹，由是日本在該地區乃得到初步發展的機會。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勢力及於南洋各地，進而占領之。在政策上，

首先隔離佔領區與英、美各國之關係，進而積極貫徹其日本化、皇民化措施，然因各地之民情、風俗，以及民族、文化上之多元性與歧異性，對於早期英、美各國之作風與施設，或延續，或新設，而且，由於日本統治各該地區久暫不同，其所發揮之影響力亦不相同，由是有其區域間之差異性，南洋如此，臺灣、朝鮮亦復如此。蓋因軍事的佔領只是過渡時期，欲長久治之，除了統治者意識之貫徹外，尚須考慮被佔領地或被統治地之特殊情形，在政策制定上，亦有不同之考量。

四開展視野、力求客觀

上述八篇文章多為日人學者之研究成果，傾向於以日人觀點來看問題，對於有關日人之戰爭責任與賠償問題，多數略而不提，亦即對於日本在各該地區之影響力，予以正面評價者多，但對於日人對於各該地區傳統文化與人民生活之衝擊與產生之摩擦，則著墨較少，為其美中不足之處，職是之故，期望未來在討論日本之殖民統治時，能擴大視野，站在世界史、國際史的觀點，來檢視戰前暨戰爭期間日本之殖民擴張，進而指出殖民主義與近代主義之間的矛盾與糾結，亦即隨著後殖民主義之出現，宜以之追究、檢討殖民史，跳脫意氣與主觀的評價，以較為理性而實證的方式，觀察殖民主義與各殖民地之間的關係。

五比較研究之基礎

本文所評介者為〈日本在臺灣與朝鮮之殖民地教育〉、〈太平洋戰爭下日本的南方教育政策〉兩個專題之相關論文，均係獨立課題之個案性研究，各篇論文不但作者不同，所探討之主題亦不相同，彼此之交集不多，在進行比較研究之討論上，難有統一的標準，但可廣泛而多元地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在東北亞與東南亞之施設與作為，提供未來比較研究之方向與課題，而且，相同課題之研究已有基礎，也可作為擴大研究及與世界其他殖民統治比較之起點。

以上僅為個人之幾點淺見，作為研讀該論文集時之參考。惟因本文評介之範圍僅限於四部中之二部，只觀察戰前暨戰爭期間，日本在臺灣、朝鮮及南洋之殖民教育，對於戰前日本在中國及滿洲之教育政策未予評介，故不無疏漏或

誤解之處，還有待更正或補強。該論文集係共同研究之成果，係由多篇不同主題之論文組成，在研究方法、問題意識、史實敘述、資料運用上，皆有獨到之處，可做為未來相關課題研究之參考與基礎，同時，不同國家學者之研究，雖有其意識型態與主觀立場，但也可為相同課題提供不同的觀點與視野，兼顧主觀性與客觀性。尤其目前臺灣學術界之研究焦點，多置於臺灣總督府與南進政策之研究，有關朝鮮、南洋之研究與資料尚屈指可數之際，該論文集之貢獻與重要性，不言可喻。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